

Y726/22

山西文史资料

第二十二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西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目 录

抗战前夕和初期我在山西工委和省委工作的回忆

.....张稼夫口述 田西如整理 (1)

一九二七年以后中国共产党在山西的活动和

一九三一年遭到的大破坏.....李志敏 (8)

党在祁县的建立和革命斗争.....阎定础 (36)

红军第二十四军的片断回忆.....陈子毅 (68)

红军第二十四军军长赫光事略.....万延祯 (79)

关于平定兵变经过的一点商榷.....任瑞祥 (81)

刘少白生平事迹..... 刘献珺 张 友 肖麦林 (82)

六十一军在天镇盘山抗战纪实.....杨维垣 (103)

太和岭口见闻与李服膺之死.....庞小侠 (110)

晋绥军对日作战回忆四则

.....郭荣显 吴法舜 孟 璧 倪 铨 (113)

山西公立法政专门学校暨山西省立法学院.....师孔彰 (122)

记山西外国文言学校……………吉范五（129）

太谷铭贤学校简史……………贺韶九（138）

解放前太原的日报、晚报及通讯社概况……杨怀丰汇编（150）

解放前外埠报纸的驻太原记者……………郭星符（182）

汾阳峪道河冯玉祥先生父母墓碑记……吴倩卿 裴荃香（186）

吴佩孚五十寿堂所见……………赵 兰（191）

质疑·补充·订正

对《解放前太原的日报、晚报及通讯社概况》一文
的补充和订正……………郭汾阳 阎云溪（194）

对《六十一军在天镇盘山抗战纪实》的商榷……吴至诚（195）

抗战前夕和初期

我在山西工委和省委工作的回忆

张稼夫口述 田西如整理

一九三六年春夏，山西党组织又一次遭到大破坏，为了整顿和加强党对山西工作的领导，北方局决定恢复山西工委。这时在太原的党员，有联系的只剩下少数几个人了。我是四月下旬红军东渡后，从北平回到山西，在太原师范学校以教书作掩护，进行党的工作的。

大约在六月间，北方局派了李宝森携带家眷到达太原。李宝森是山西清源县（即今清徐县）人，过去曾在山西大学读书。他到太原后，和我接上党的关系，任我为工委文教委员，分工主持工委文教工作。

李宝森到山西后，按照北方局的指示，首先恢复了山西工委。李宝森担任书记，武永祥担任组织部长。武永祥是平遥县人，曾在太原师范读书。阎锡山在一九三六年红军东渡以后搜捕共产党员时，他以“新新通讯社”记者的身份作掩护，保持了一些党员的关系。在山西工委恢复工作时，主要依靠了武永祥保存下来的关系。工委的宣传部长由赵仲池担任。

山西工委恢复时，刘少奇已主持了北方局工作。为了加强对山西工委的领导，十月间，北方局又派张友清来到山西。同张友清一起到山西的还有徐子荣、赵振声（即李葆华）。张友清到太原后，住在胡西安家中。胡西安是阎锡山的亲戚，共产党员，做

党的秘密工作。徐子荣住在我家。在我家住的还有张永青，是榆次人，负责刻印党内文件，他叫我表哥。根据北方局指示，改组了山西工委，由张友清担任书记，赵振声担任组织部长，宣传部长仍是赵仲池，徐子荣为秘书长，我任工委的文教委员。山西省工委改组的同时，恢复了中共太原市委，由赵林任市委书记。记得王耿人、王世益和康永和也参加市委工作。康永和以后专门搞工人武装自卫队。太原失陷后，工人武装自卫队扩编为工卫旅。

一九三六年九月，薄一波等根据北方局指示，回到山西同阎锡山搞统一战线工作，成立了一个十六人的工作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直属北方局领导，不同山西工委发生组织联系。当时在山西还有一个党的特科系统，主要搞情报；也不同山西工委发生组织联系。

一九三七年五月前后，根据当时已经出现的抗日救亡新形势，为了掀起抗日高潮，积极发动广大群众参加抗日活动，工委通过牺盟会组织，办起了各种训练班，有军政训练班、民训干部团、国民兵军士训练团及国民兵军官教导团、村政协助员训练班、牺盟会特派员训练班。在这些训练班中受训的学员，大都是进步青年和共产党员，他们在以后的抗日战争中，成为建立新军武装、创立抗日根据地的骨干力量。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刘少奇同北方局的其他负责同志杨尚昆、彭真、朱瑞、林枫、李大章等来到太原。接着，周恩来和徐向前、肖克等同志也到达太原，住在八路军办事处（在成成中学内）。我党的高级负责干部到达太原后，使太原的抗日群众运动又出现了新的高潮。为了加强山西省工委的领导，北方局又加派林枫为省工委副书记。

抗战爆发后，山西省工委的工作主要是发动和组织群众参加抗日武装斗争。一九三七年八月，我党通过牺盟会将国民兵军官

教导团和军政训练团改编为山西青年抗敌决死纵队，紧接着在各县普遍建立了自卫队和游击队，并向全省一百零五县派出了牺盟特派员。在太原失守前后，我党通过各种形式组织起了以续范亭为首的战地动员委员会和暂一师，随之又组成了工卫旅、政卫旅、二一二旅、二一三旅、少年先锋队等抗日武装。为了同阎锡山的晋绥军相区别，牺盟会组织起来的抗日武装叫新军，晋绥军叫旧军。我党从八路军中抽调了一批干部派往新军，加强了党对新军的领导。牺盟会派往各县的特派员，大多数是共产党员，其中有的还担任党的县委书记。当时阎锡山规定牺盟特派员为县政府当然领导成员，因此，这些特派员在创立抗日根据地、组织抗日武装、发动组织群众方面，都起了很大作用。

一九三七年十月，太原失守前大约两星期，林枫、张友清找我谈话，根据形势的需要，北方局决定将山西工委一分为四：赵仲池调晋西北工作，赵振声调晋东北工作，徐子荣调冀鲁豫工作；将我们随阎锡山总部一起行动的这个党委改称山西省委，由我担任秘书长，并增设省委军事部，主管新军和游击队的工作，从八路军一一五师调来黄骅担任部长。

黄骅是湖北湘鄂赣根据地的老同志，木匠出身，人很精干，军事上有经验。当时在山西省委的主要领导干部中，林枫同志是平津学生出身，张友清同志刚从监狱出来，我是地下党员，谁也不懂军事。黄骅到省委后，抓军事很有办法，对组织训练新军有重要贡献。

太原失守前，林枫、张友清又对我说：“太原看来守不住了，阎锡山的总部要往临汾撤，我们省委也要到临汾，你先到临汾前站，找住房。”接受任务后，我就离开了太原。

十一月八日，太原失守。省委规定，共产党员不准过黄河，要在山西坚持抗日武装斗争。那时，国民党军队一直向南溃退，沿途扔掉许多枪枝弹药。我们就把这些枪枝弹药收集起来，组织抗

日游击队，由黄骅负责训练。省委组织的抗日武装部队，抗战初期活动在洪洞、赵城、新绛、灵石、孝义一带。

山西省委到了临汾时，带有一部电台。我们可以随时和上级党组织取得联系，听取指示，汇报情况。以后阎锡山退到吉县，又退到陕西省宜川县秋林镇。我们省委拉上部队到了乡宁山上，正式组织起省委卫队，名义上叫一一五师独立第一游击大队。当时一一五师师部在孝义，北方局也在孝义。北方局对外的名义叫总政后梯队。开始，这支省委卫队有两个连，黄骅任队长。我们在乡宁山上自己编教材，训练干部，发展武装。当时省委主要抓四件事，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群众工作。抗战以后，阎锡山的县长跑了，我们就派县长，组织抗日政府，开展反汉奸、反恶霸、反贪污，以后搞减租减息，在吕梁山上建立抗日根据地。当时，在这一带活动的部队有一一五师的晋西支队，是一个团的兵力。还有韩钧领导的决死二纵队，有一个旅的兵力。省委卫队发展到一个团的兵力。这一地区属山西省第六行政区，张文昂为决死二纵队政委兼六专署的专员，张衡宇任六专署的秘书长。

山西省委到晋西以后，在四个区域内成立了四个特委。在离石、中阳一带建立了离中特委，由肖扬任书记，赵守攻任副书记；在洪洞、赵城一带建立了洪赵特委，由王一夫任书记，刘钧任副书记；在乡宁、吉县一带建立了乡吉特委，由武光任书记，李颀伯任副书记；在汾河以东地区组织了河东特委，由阎子祥任书记，温建平任副书记。在晋西一带省委建立起来的抗日根据地，叫吕梁山抗日根据地。山西省其他地区的党组织这时已不再归山西省委领导，由各个根据地的党组织领导了。

山西省委到临汾后，周恩来、刘少奇以及北方局的负责同志也到了临汾。为了补充八路军，周恩来副主席向山西省委提出了“二十天扩军三千人”的任务，让山西省委办。省委决定由我负

责。那时，青年参军的劲头很高，仅用了半个月的时间，就超额完成了任务。

扩兵工作结束后，林枫调到北方局接替彭真当了组织部长，仍兼任山西省委书记。省委留下张友清、黄骅和我三人负责。一九三八年五月，党中央根据山西的形势，认为各个抗日根据地已创立，都已建立了各地党的组织，于是将山西省委改为晋西南区党委，驻在孝义。晋西南区党委组成时，林枫为书记，王达成为组织部长，张友清为宣传部长，黄骅为军事部长，我仍为秘书长。

一九三八年秋冬之交，我随同曾思玉带的部队回到了孝义。一九三九年春，晋西南区党委决定派张友清到秋林，同薄一波相配合，领导进步势力同阎锡山顽固势力进行斗争，我接替张友清任晋西南区党委宣传部长。

一九三九年十月，阎锡山准备向山西新军发动进攻，林枫在延安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意见，以山西省委的名义发表了一个声明，对山西出现的反共反人民的逆流表明了我党的立场和原则。党中央、毛泽东主席非常关心山西的局势，随时通过电台了解阎锡山的动向和山西发生的情况，区党委一方面直接向中央报告，一方面通过在秋林的八路军办事处（主任王世英）向中央报告。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阎锡山部署好了对山西新军的军事进攻，同时和日本侵略者勾结，决定互相配合先消灭决死二纵队。十二月一日，阎锡山向决死二纵队发出“冬季攻势”命令，要韩钧出击同蒲路上的日军。韩钧看破了阎锡山的用意是想前后夹击，乘机消灭二纵队，因而回电阎锡山，拒绝了他的命令，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阎接到电报后，立即宣布“韩钧叛变”，通电全国，以此为由，发动了向新军的全面进攻。事变发生后，区党委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确定了一方面对进攻新军的顽

固军队以坚决的打击，一方面争取阎锡山内部的一切可以争取的人，避免发生大规模内战。同时确定了打陈（陈长捷）拉阎的策略，尽量不公开刺激阎锡山。在同顽军打仗时，一律以决死二纵队的名义打，实际上参加打仗的是陈士榘、黄骅带领的晋西支队和决死二纵队一起打的。这时晋西支队，已和省委卫队合并，陈任支队长，黄为副支队长，林枫为政委。下辖两个团：一团团长是杨尚儒，二团团长何以祥。实际曹诚、李文炯的游击三团和政卫旅以及高佩勋游击支队，也都合并到晋西支队去了（具体改编情况，我记不清楚了）。十二月六日，根据区党委的意见，正式成立了“抗日拥阎讨逆指挥部”，由六专署专员、决死二纵队政委张文昂任总指挥，决死二纵队政治部主任韩钧任前敌总指挥，决死二纵队四团政治主任郝德青和决死二纵队五团政治主任廖井丹等也参加领导。我负责后方留守处，包括区党委和六专署机关、报社、剧团等。

这时，阎锡山派出了大批军队（号称六个军）由陈长捷指挥包围决死二纵队，同时由日本侵略军封锁了汾阳到离石的公路，想一举消灭我们。我们的部队利用熟悉的地形，在运动中打击敌人，使敌人始终不能将我主力包围。打了一段后，部队的弹药没有了，我们把部队拉到中阳县下三交一带去补充。不久，军委命令我们向晋西北转移。我们除留下王达成、龚子荣等在孝义、洪赵一带坚持工作外，其余随部队转移。这时，军委已派滕代远到了晋西北。在晋西北部队的接应下，我们很快就突过了汾离公路，同决死四纵队会合。我们到了晋西北后，滕代远按照中央军委的指示，把晋西北的一二〇师彭（彭绍辉）八旅、决死四纵队、暂一师、工卫旅和从晋西南去的晋西支队、决死二纵队等部队统一起来，组成“抗日拥阎讨逆指挥部”，反击旧军的进攻。原计划打一下晋绥军，使其不敢再攻击新军就行了，结果晋绥军不吃打，刚打了一下，就溃不成军，赵承绶一溜烟跑过了汾离公

路，晋绥军全部退出了晋西北地区。

为了维持我党和阎锡山的统战关系，党中央指示我军不要过汾离公路追击晋绥军，于是我军在汾离公路以北停了下来。以后，党中央派王若飞和肖劲光到秋林同阎锡山进行了谈判，达成了划汾离公路为界的协议。即晋西南划定为旧军的吃粮区，晋西北划定为新军的吃粮区。晋西南地区我党的组织，在张友清领导下转入地下，隐蔽起来。仗打完以后，一二〇师主力从冀中回到晋西北。晋西支队由陈士榘、黄骅带领归还一一五师建制，到了山东。党中央根据这一地区的形势，决定把晋西南区党委和晋西北区党委合并为晋西区党委，由林枫担任书记，原晋西北区党委书记赵林担任副书记。接着，我党在这里成立了晋西北行政公署，由续范亭任主任。从此以后，晋西北就成为屏障陕甘宁边区的一块重要的抗日根据地了。

（本文作者张稼夫现任中国科学院顾问）

后 记

此稿是一九八〇年五月十六日我访问张稼夫同志的记录稿。五月二十三日，我把十六日的记录稿送给张稼夫同志，由我读，张稼夫同志边听边改。一九八一年四月，山西省社会科学研究所决定出山西革命斗争回忆录，提出想用这一稿件，五月二十四日，我同王敏启同志一起到张稼夫同志家，再次同张稼夫同志一起修改了一九八〇年五月二十三日的修改稿。五月二十四日第二次修改稿后来登在《晋阳学刊》一九八一年第四期（增刊）上。张稼夫同志看到这个稿子后，认为有必要再做一次修改。一九八一年七月九日下午，我同任植生、霍成勋同志一起到晋祠宾馆去看张稼夫同志，并再次一起对此稿进行了修改。这次参加讨论修改的有：王修、甄元素、黄征、任植生、霍成勋。现在的这个稿子，就是七月九日讨论修改后的定稿。

田首如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三十日

（田首如现在山西省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

一九二七年以后中国共产党在山西的活动和一九三一年遭到的大破坏

李志敏

我于一九三〇年三月四日，参加唐山兵变（组织革命暴动的一种形式）失败后，回到天津。在天津参加了纪念“四·一二”惨案三周年游行示威和打《大公报》报馆的活动。四月下旬，北方局派我回到太原工作。当时山西党的负责人是冯彦俊。我的任务是参加军委搞士兵运动，准备暴动。八月初我回崞县家乡治病，十月初返回太原。这时刘天章、谷雄一、娄凝先等到太原领导山西的党团工作，山西的情况起了很大变化。当时，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党如果采取正确的路线，是很容易发动和团结广大群众进行斗争的。但由于执行了“左”倾盲动的错误路线，又因叛徒的出卖，结果使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给革命事业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

我是一九三一年十月二十四日被捕的，十二月下旬被判处无期徒刑，送到山西第一监狱。一九二七年所谓“清党”以来被捕的绝大多数同志都关在这个监狱，其中有王世益（已故）、郭洪涛（现任国家经委副主任）、杨高梧（何英才，已故）、赵秉彝（马林，现任山西省政协副主席）、侯富山（已故）、张勋（张文昂，已故）。我与他们在狱中长期相处，从他们的口中了解到山西地下党组织的许多情况。最近几年我又查阅了部分资料和访问了一些老同志，对一九二七年以后中国共产党在山西的活动有了

概括的了解。为了整理历史资料，现在作一个粗略的叙述。

一、国共合作时的山西形势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山西省党部对共产党的残害

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山西始有国民党的秘密活动。当时国共合作，国民党在山西的活动，多由共产党员主持。一九二五年成立了中国国民党山西省党部。省党部委员九人，其中有国民党员韩克温、苗培成、李江(冠洋)、郭树棠、杨笑天，共产党员王瀛、孙真儒、王鸿钧、彭兆泰；候补委员五人，其中有国民党员高淑英、艾晋太、郭毓都、苏一山，共产党员朱志翰。具体分工是：韩克温、苗培成、彭兆泰为常务委员，王瀛为组织部长，李江为宣传部长，王鸿钧为农民部长，孙真儒为工人部长，郭树棠为青年部长，朱志翰为妇女部长，艾晋太为商民部长。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山西省党部，于五月间宣告破裂。

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八日，李大钊等就义的消息传到太原后，激起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极大愤慨。中共山西省委当即决定于五月九日上午在国民师范大礼堂举行追悼李大钊等同志的大会。大会由张勋(张文昂)任主席，薄书存(薄一波)负责布置会场。阎锡山竟派两个营包围了会场，当场逮捕了张勋、武学和等四人。

阎锡山在北伐时持观望态度，待到“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看到蒋介石有统一全国的可能，遂于六月自称北方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悬挂青天白日旗，开始出兵对奉军作战。从此蒋阎合流，国民党山西省党部进行改组。阎锡山的亲信赵戴文、南桂馨、温寿泉等与亲蒋的韩克温、苗培成等十一人为山西省党务改

组委员，成立了不包括共产党人在内的山西省党部，并立即下令通缉曾同国民党合作过的共产党员。名单中有崔锄人（当时中共山西省委书记）、王瀛、朱志翰、王鸿钧（后为托派）、邓国栋、薄书存、赵秉彝、杨高梧、孙真儒、彭兆泰、王箴（国共合作时任国民党太原市党部组织部长）等，当时他们已离开太原，未遭毒手。



王 瀛烈士

一九二七年七月，蒋介石通令全国“清党”，将国共合作时期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清洗出国民党，并逮捕杀害。国民党山西省党部成立了清党委员会。中共党员王瀛、朱志翰夫妇于八月份由武汉秘密返回山西后，途经崞县被敌人捕送太原清党委员会。一九二七年十月十一日阎锡山下令判处王瀛死刑，即日执行，朱志翰被判无期徒刑（一九三二年减为十五年，一九三五年下半年释放）。

自此以后，山西的党组织在国民党和阎锡山的双重白色恐怖中转入地下，不屈不挠地进行英勇的斗争。当时由于反动势力强大，而党尚处在幼年时期，缺乏经验，存在“左”倾盲动的错误，一再失误，致使党组织受到严重的破坏。

二、国共分裂初期党在山西活动中的“左”倾盲

动错误。周恩来写给顺直省委并汪铭的指示信

一九二七年“八七”会议之后，中央虽然纠正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但纠右没有防“左”，以致“左”倾错误抬头。它的表现是：不去组织有秩序的退却，而是不顾敌人的强大和

革命失败后的群众情绪，命令少数党员和少数群众在全国组织盲动冒险的地方起义。山西省委接到“八七”会议的文件后，就是根据文件中发动群众暴动的指示，计划在祁县组织农民武装暴动的。后因王瀛被捕，山西省委为了给王瀛报仇，又轻率地决定，乘国民党在太原新华舞台举行庆祝一九二八年新年晚会时，炸毙坐在大会主席台上的黄色工会主席杨笑天。这一任务交由王世益、赵焕星（二人均搞工会工作）执行。赵暗藏手榴弹，王带猪尿泡装的汽油准备放火。赵由于心情激动，手榴弹未甩出去即爆炸，赵本人及临近的一个国民党县长被炸死，伤数人。王世益乘乱逃脱。这件事一时轰动太原，给敌人以镇压和屠杀共产党以借口，使党在太原的活动增加了困难。

一九二八年春节后，山西省委召开了省委扩大会议——霍州会议。这次会议是在霍县城东的破庙里召开的，会议由省委书记王鸿钧主持，王世益、杨高梧、邓国栋、赵秉彝、崔锄人、王鸿玉、周玉林、王宪仁（西平、正平）等以及各地党员代表约二十余人参加。参加这次会议现在还健在的只有时逸之（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和赵秉彝（马林，现任山西省政协副主席）二人。

霍州会议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但发展了“左”倾盲动的错误，使党组织连续遭到破坏。

会议主要根据“八七”会议的精神检查总结了半年来的工作，批判了前省委宣传部长王鸿玉（戒子桐的化名，后投靠孔祥熙）炸新华舞台的错误决定，不适当地处分了一些同志。会议并改组了省委，选举王世益为书记，杨高梧、王鸿钧、关广荃、邓国栋等七人为委员。霍州会议虽然检讨了炸新华舞台的“左”倾错误，但是仍然认为山西革命形势在继续高涨，决定把全省划成七个暴动区，即祁介（祁县、介休）、晋城、河东（运城地区）、灵汾（灵石、汾阳）、赵霍（赵城、霍州）、太原、阳泉，准备组织武装暴动。

一九二八年三月，省委同志分别到各县传达省委扩大会议精神时，周玉林(共青团省委成员)在晋南新绛县被捕，邓国栋在晋中祁县张庄被捕，杨高梧在太原被捕，王世益和赵秉彝也先后被捕。由于省委秘书长关广荃的叛变，全省各地的党组织十之八九遭到破坏，前后被扣捕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一百余人之多。由于被捕的人日益增多，除了山西第一监狱收禁被判刑的政治犯外，阎锡山还成立了自新院(后改为反省院，一九三七年五月解散)，采取软硬兼施的办法迫害共产党人。

去中央联系工作的汪铭得知省委被破坏的消息后，立即返晋，找到霍县县委书记李光杰和党员阎念先。经过整顿又重新组织了临时省委，王世隆(榆社人，排字工)任书记，汪铭、王鸿钧、赵秉彝、杨新活、秦晋翰、阎念先等七同志为委员，后又推赵源为太原市委书记。(赵源，字子长，五台人，一九二九年冬，北方局派他到驻唐山晋军李生达部搞兵运工作。一九三〇年二月被捕，解到天津被判刑八年，后转押于北平军人反省院，病故)。当时经过重新登记的党员仅二十二名(原有数百名党员)。在此情况下，山西党组织不是采取长期隐蔽和积聚力量的方针，而是四出活动，散发传单，并贴出“打倒国民党和阎锡山”的标语。结果约在一九二九年初，又有李生华(太原市委委员)等六人被捕。赵源同志离开太原，王世隆叛变。这时山西党组织大部遭到破坏，党员有的离开山西，有的消极脱党，有的坐牢，也有个别的叛变。党组织进行活动极端困难。

一九二八年七月，在莫斯科召开了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认为当时革命形势处在两个高潮之间，反革命势力超过革命势力，党的总任务不是进攻，不是组织起义，而是争取群众。大会清算了陈独秀的投降主义和盲动主义。“六大”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缺点是对“八七”会议后的“左”倾错误没有从思想根源上加以解决，从而导致了后来“左”倾思想的片面发展和

极端扩大（见《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九二八年七月三十日，中央曾写信给山西省委，指出山西省委春节后召开的扩大会议（指霍州会议）的决定“显然犯了盲动主义的错误”，并指出当时缺乏群众斗争的基础，“无论乡村或城市都缺乏暴动的主要的根本的条件”，如果现在搞暴动，“结果暴动不能起来，群众的情绪反会因遭受一时的挫折而低落下去”。因此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发展党的组织，组织群众到赤色工会、农协、士兵委员会中去，根据群众的切身利益，领导他们组织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进行斗争”，要使群众相信自己的力量，而不是“只靠三五十个人的游击队替他们打抱不平”。中央的这些指示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中央的指示信中没有强调目前应该隐蔽和积聚革命力量，而是强调要发动群众，“建立赤色工会和工厂委员会，消灭反动工会”，在农村则要求“群众斗争一经起来，即实行选举村政府——苏维埃——，没收地主土地分给佃农”，要“杀村长、地保豪绅”，“甚至焚烧他们的房子”。这些都又反映了“左”的思想。

一九二九年初，幸免于难的汪铭到天津找到顺直省委（即大革命时期的北方区党委），向中央写了报告，要求中央派干部来太原恢复党的组织。一九二九年三月二十五日周恩来同志为中共中央起草了给顺直省委并汪铭同志的指示信——《在白色恐怖下如何健全党的组织工作》。信中指出：由中央派人去恢复各省组织，由于缺乏社会基础，“工作既没做起，而机关已立，于是这个架空的组织，在社会中便极易为敌人发现，屡遭破坏，在党内因有了这些不落实的机关，反足以助长同志依赖机关、忽视下层群众工作的错误观念。因此，中央特改定，各级党部的设立，必须其所管辖区域的下层组织已经建立起来，工作已有开展，然后才能由此种下层组织成立上层组织”。根据这一组织路线，“中央决定，目前山西可不成立省委，先着手于地方工作的恢复和建立，

山西工作改归顺直省委兼管。整顿地方工作的程序，应先从中心区域做起，如太原、阳泉、绛州、榆次、河东诸地。目前第一步工作，便应先在这些地方寻找有社会关系的同志，建立党的基础。工作恢复开始，党员的线索并不求多，重在质量的选择，要有一人能得一人之用”，“假使在太原、榆次这类地方，仅只找到几个同志，最初便须以支部的形式开始他们党的生活。……假使我们能在每一地方，得到几个能深藏在群众中能领导群众斗争的同志，则便是仅仅这几个同志，便是仅仅一两个工人支部，也会使这一些组织成为山西工作发展的核心。要在一个地方有了几个健全的支部后，再成立地方党部——县、市委的组织。务使这一组织，能从几个有群众基础、有社会关系的支部基础上建立起来，县市委负责同志也要多由在业同志选出担任，这样才能避免空架子机关的毛病。”“根据上述的办法，目前山西实无集中一部分同志到太原的必要。便是太原的工作，也只能设法在当地找有社会职业或下决心找社会职业的同志，去开始恢复党的工作和建立党的基础。”（见《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9—21页）

汪铭根据中央的重要指示，首先在太原市织布工人中找到四名党员，组织起一个支部。不久，经中央同意恢复中共太原市委，书记汪铭，组织部长方喜彦（又名冯彦俊），宣传部长吉甫（又名齐子甲）。市委下设军委和工委，创办了党内刊物《太原工农兵红旗》（油印）。

一九二九年三月以后，太原市委在学生、工人、市民、阎军中恢复和建立了基层党组织，党员人数回升到三十名左右，并在河东积极恢复晋南七县的工作。汪铭不幸于一九二九年七月在太原街头被捕。敌人认为他是重要的嫌疑犯，虽无口供和证据，但一直单独关押。看守栾有春，是阎增祥（即阎子祥，现在北京国家建筑工程总局工作）的同乡，汪铭介绍他成为党员。经过栾有春，汪与外面发生了组织关系。阎增祥从晋南到太原就是经过栾